

# 《六书故》的汉语汉字系统论

陈会兵

(重庆三峡学院中文系, 重庆万州 404000)

**摘要:**南宋末戴侗编著的《六书故》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一部重要著作, 他从我国古代哲学的系统观念出发观察语言文字现象, 认为汉语汉字具有系统的一般属性, 运用传统的系统生成理论重新编排文字体系、探索训诂理论、解说语言文字, 为清代“小学”的鼎盛奠定了理论和方法的基础。

**关键词:**《六书故》; 汉语汉字; 系统论; 训诂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H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2006)02-0020-04

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认为, 语言是一个由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成分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系统具有系统的一般特征。从系统论出发, 索绪尔建立起了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 对世界语言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朴素地认识到世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其间万事万物构成一个个小系统, 这些不同层级的系统, 环环相扣、普遍联系、相互作用、永恒发展, “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 “阴阳、五行”,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等等, 就是对世界系统性的概括表述。语言文字也是世界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系统, 也具有系统的一般属性。语言文字系统中的内在联系就是形、音、义以及语言组织规则的联系和相互影响。

戴侗, 字仲达, 永嘉人(今浙江温州人), 生卒年不详, 南宋淳祐(1241—1252)间进士, 曾任秘书郎。《六书故》<sup>①</sup>及前附《六书通释》是戴侗积三十年之功而成的一部重要的语言文字学著作, 充分展示了他的语言文字学思想和研究成就。他从中国传统的系统观念出发, 把汉语汉字视为具有广泛内在联系的错综复杂的有机系统, 从而展开了汉语汉字研究的新篇章。唐兰认为: “他对于文字的见解, 是许慎以后, 惟一的值得在文字学史上推举的。”<sup>[1]</sup>

## 一、汉语汉字系统论

汉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 具有生成性。“夫文生于声者也, 有声而后形之以文, 义与声俱立, 非生于文也。生民之始, 弗可考也已; 以理而逆之, 被发裸形、击剥挽列以为衣食, 其气未柔, 若禽兽然, 其智未辟, 若婴儿然, 仅能号呼, 其欲恶喜怒以相告语而已矣; 稍益有智, 然后渐能名命百物而号召之声稍备矣, 文字未兴也; 其类滋、其治繁, 而不可以莫之征也, 然后结绳之治兴焉; 治益繁、巧益生, 故有刻画竹木以为识者, 今蛮夷与俚俗不识文字者犹或用之, 所谓契也; 契不足以尽变, 于是象物之形指事之状而刻画之以配事物之名, 而简牍刀笔兴焉, 所谓书

收稿日期: 2005-09-05

作者简介: 陈会兵(1967-), 男, 重庆人, 讲师,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先秦文学、文献和汉语史

① 戴侗. 文渊阁四库全书·小学类·六书故[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也；象形、指事犹不足以尽变，转注、会意以益之，而犹不足也，无所取之，取诸其声而已矣，是故各因其类而谐之以其声……水之形可象也，而其别若江若河者不可悉象，故借工以谐江之声，借可以谐河之声，所谓谐声也；五者犹不足以尽变，故假借以通之，而后文字之用备焉。六书之义虽不同，皆以形声而已矣（笔者按：记录语言的音，进而表示语言的义）。六书不必圣人作也……圣人者作，命神瞽焉；窃其名声，命史氏焉。同其文字，釐其烦慝，总其要归而已矣。”戴侗对“六书”造字法以及语言文字系统的产生过程的推测是合理的，先号呼而后语言，先语言而后文字，先刻画而后书契，这是今天学者仍然普遍认同的语言文字产生发展的观点。他深刻的认识到语言文字是一种社会系统，是社会需要和社会发展的产物，语言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根据，是人民而不是“圣人造书契”。汉语汉字音、形、义之间的关系是由义而生声，由音、义而生字，文字系统产生于语言系统：语言的义、音是第一性的，而文字的字形则是第二性的，是代表音义的书写符号，他从理论上阐明了语言与文字两个系统的关系，“圣人之言与文相副，言出于口，文立于策，俱发于心，其实一也”（王充《论衡·问孔篇》），“书者言之记”（孔颖达《尚书》孔序疏）。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他继承并发展了前人对语言和文字关系的正确认识，在今天看来仍然是科学的。

语言文字系统具有有机性。字词是相生相成的，字义词义也是引申发展（即所谓“充类”、“推类”）的：“学书之道，充类为大，通于六书者，可以通于知类，通于知类者，可以无不知圣功之始也。道从辵，本为人之行路，理从玉，本为玉之文理，引而申之，则道之广大，理之精微者无不通，此充类之术也”。“六书虽狭，而其用博。充类为大，假借次之，去繁从古，然后精义著焉。”

所谓“充类”，按照戴侗的解释就是词义引申，一个词由具体、形象的意义扩展到一般、抽象的意义，从而使它能概括类似的情况和现象，表示更多的事物，具有更多的词义，就是引申。

《六书故》通过对字词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的梳理以及义类的归纳，使之形成层级不同的词义系统。他将汉语词义的引申和词语的假借视为语义系统生成发展的两个主要途径，符合汉语（也包括其他语言）发展的实际情况。语言文字要表达的自然和社会的内容（意义）是无穷无尽的，而语言文字本身的形式（语音、文字、语法规则等）总是有限的，通过引申和假借就可以用语言文字中原有的形式来表达新的内容，符合语言经济性原则。

“六书推类而用之，其义最精。昏本为日之昏，心目之昏犹日之昏也，或加心与目焉；熏本为烟火之熏，日之将入，其色亦然，故谓之熏黄，《楚辞》犹作纁黄，或加日焉，帛色之赤黑者亦然，故谓之熏，或加糸与衣焉，饮酒者酒气酣而上行亦谓之熏，或加酉焉。夫岂不欲人之易知也哉，然而反使学者昧于本义”。

“推类”则揭示了汉字系统衍生的主要方式，即在原有文字（初文）的基础上添加形符而形成新字、表达新义，这种“推类”造字区别了后起字（词）的字形、字义，但同时又掩盖了其本来意义（有利有弊，两害相权取其轻，为表达新义而不惜掩盖本义），这是形声字产生的一个主要途径；“推类”从造字原理上对宋朝王圣美的“右文说”给予了发生学解释，对“右文说”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着“右文说”的长足发展；“推类”说还打开了字源、词源研究的门径，戴侗在《六书故》中从形声字声符入手，梳理初文和孳生字（即其所谓父、子、孙）之间的关系，探讨形声字产生的几种途径，区分不同情况，系联了不少同声符的形声字，他所做的实际上就是探寻字源和系联同源词的工作。<sup>[2]</sup>

字源、词源研究对汉字汉语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是汉字系统和词汇、词义系统产生的根源。对字源、词源的探索表现出戴侗在系统观指导下的追本求源精神，抓住了语言文字研究的

根本和关键,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本书体例的限制,他做得还远远不够,但是,其开创的意义是不应该低估的。

“先人曰:载籍之兴也,肇乎文,合文以成辞,属辞以达志,毕志以成章,辞助也者,所以贯其文,达其辞而畅其志也,故学者必辨乎书名(实词)而味乎辞助(虚词),辨乎书名而义著,味乎辞助而意得,穷天下之载籍,无有逃乎此者,不待注释而皆可通”。书名、辞助是汉语的两大词类:一为实词,一为虚词。从语言运用的角度看,汉语词汇可分为两个小的系统,这两个系统各有特点和用途,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汉语词汇大系统,达到“贯其文、达其辞、畅其志”的表达要求,即“辨乎书名而义著,味乎辞助而意得”,如此,则“穷天下之载籍,无有逃乎此者,不待注释而皆可通”。戴侗从语言运用出发,将汉语词汇分为书名、辞助两大词类,比宋人诗论词论中划分语词为“虚”“实”更符合语言学意义上的词类划分标准。<sup>[3]</sup>

语言文字系统具有发展性。系统内部的矛盾、一阴一阳的交互作用是系统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声,阳也;文,阴也。声为经,文为纬,声圆而文方,声备而文不足。”声为阳,文为阴,阳动阴静,阴阳交互,是语言文字运动变化的依据;形与声、阴与阳对立统一、“声备而文不足”的矛盾运动是语言文字发展的形式。语言、文字都是不断发展的,语言是文字发展的根据,文字包括其他语言形式适应语言的发展而发展。

“声,阳也;韵,阴也。声为律,韵为吕。今之为韵书者不以声为纲,而凿者每以韵训字,故其义多忒。声之相通也,犹祖宗众姓之相生也,其形不必同,其气类一也。虽有不同焉者,其寡已矣。韵之相迹也,犹猩猩爱似人,蟾之似蛇,其形几似,其类实远。虽有同焉者,其寡已矣。台、余、吾、我、印皆为自谓之名,尔、汝、而、若皆为谓人之名,谁、孰、若皆为问人之名,此声之相迫者也。春之为言蠢也,德之为言得也,祖者且也,子者滋(孳)也,丑者纽也……此所谓韵之相似者也。不能审音而配韵以立义,未有不为凿说者也。”在语音系统内部,“声阳韵阴”又构成一对矛盾,声纽是“声阳韵阴”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语音发展的枢纽,意义通过声纽促成语音的变化和发展。这段论述成为清代戴震、钱大昕、章炳麟“声转”理论的直接源头,只是由于上古声母研究至今成绩不大,这一理论的影响也就有限。汉语的声纽就像汉语家族的始祖,由它繁衍出的子子孙孙构成汉语汉字大家族。

汉语汉字系统是一个有秩序的层级系统。以象形、指事两书为文(独体文为文字之父),会意、形声为字(合体字为文字之子,由独体之文孳生),转注借象形、指事、会意字形而倒写,假借借音以表义,提出了新的“六书”主张(尽管与许慎有许多相同之处)。据形成文,合文为字,叠字成词,联词成句,集句成章。把握了其中的规律,就掌握了汉字和汉语。“六书所以章名物也,……凡一言以为名者,皆具于六书矣;一言不足以尽名,则合文以为名;合文以为名者,非六书所能具也,故先王之法有书有名。”名是事物的概念,汉语表达事物的概念有单音节的,即“一言以为名者”,可以用六书直接造字表示,词义通过两个主要途径即引申和假借发展,即“假借以通之,触类而长之”;也有“一言不足以尽名”的双音节和多音节词,这是六书不能直接表示的,由于汉字是单音节方块字,一字一音,就需要合两字或多字才能表示事物的概念,还有“两言不足以尽意”,“则合辞以尽之”,触及到汉语多音节词和词组的构词问题和句法问题,可惜,他没有展开论述,这是由该书体例主要是阐述他的六书理论决定的,同时也因为中国传统语言学只注重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语法研究十分薄弱。汉语不同于其他语言,它主要是通过词汇、虚词和语序来表达语义,缺乏语法形式。戴侗本人就认为“六书苟通,由是而往,天下之书不待注疏皆可读也”。从系统上把握语言和文字,可以提纲挈领、以简驭繁。

语言文字系统具有自足性。汉语汉字系统层层衍生以至于无穷，从而就可以表达无穷无尽的客观和主观世界，使语文系统（语言形式）和事物系统（语义内容）得以相称。“天下之物名无穷，而书有限也，然则书之用其穷乎？”亚里斯多德说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有限的语言形式可以表达无限的意义内容，文字系统适应语言系统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的需要而发展：“凡书独立为文，胖合为字。文犹八卦也，文立而字孳，因而重之，犹八卦之为六十有四也。假借以通之，触类而长之，一言不足以尽名（名是事物，在语言来说就是词），则合言以尽之；两言不足以尽意，则合辞以尽之。书穷则变，变则通，天下万物之名理备矣。”“六书之中，天文、地理、人事、物则备矣，苟能因其自然之文以求其自然之则，由是以稽圣人之言，以通天下之故，以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可以行其无所事矣。”

戴侗对语言文字系统的研究有综合，有分析，总是立足于汉语汉字系统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孤立、片面的看待语言文字现象，因而他取得的成就是同时代其他人所不及的。

## 二、汉语汉字研究方法论

在语言文字系统论的观照下，戴侗对汉字系统进行了不同于《说文》“以形系联”的重新排列，创立“以义系联”的文字编排体系，按义类分九部：数、天文、地理、人、动物、植物、工事等名义明确的七类，另加不够明确的“裸”和“疑”两类。“侗之为书也，先契以本文，立一以起数，是故数为首；次二曰天，凡本乎天者从上；三曰地，凡本乎地者皆从下；次四曰人；次五曰动物；次六曰植物；次七曰工事；七者备矣，归余于裸，缀疑于末，而六书之道尽焉。天地之大也，日月星辰之昭也，山川丘陵之广也，人事之殷也，物产之夥也，古今之长也，治之以七者皦如也。简而不遗，繁而不乱，知吾说者之于天地万物也，其如视诸掌乎。”每类又各分细类，如“人”下又分九类，分别以人和人的肢体之文为文字衍生之母，由此衍生成百上千的孳生字。

“凡予之为书也，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以辨其族”，立四百七十八个目，其中一百八十八个是文，四十五个是疑文，二百四十五个是字；“父以联子，子以联孙，以统其宗”，文和疑文是独立的原始初文即“父”，主要是那些象形字和指事字，二百四十五个字是由父而生的“子”，其他的成千上万的字则是由“父”“子”而产生的“孙”，从而构成一个个汉字家族。照他的说法，一切文字，“宗统同，族辨异”，可以归入二百多个指事象形的文或疑文的项下，纲领清楚，系统完密。“故视繁若寡而御万若一，天地万物之富，不可胜穷也，以是书而求之，则若数二三焉。故曰知治六书者，其知所以治天地万物矣。”戴侗“以义系联”是汉字字典独特的文字编排体系，汉字有形、音、义三要素，“以形系联”的《说文》类，“以音系联”的《切韵》类，“以义系联”的《六书故》类鼎足而三，体现出寻求汉字编排的多个途径。

《说文》开创了汉字“以形系联”的体系，在文字学史上第一次使成千上万的文字依据字形部首有机地联系成了540部，《说文》编排文字，“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者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以字形为书，俾学者因形以考音与义，实始于许，功莫大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具有初步的系统性。戴侗批评《说文》的文字编排杂乱，割裂了汉字系统之间的联系。说：“许氏之为书也，不以众辨异，故其部居淆杂；不以宗统同，故其本末离散。”他的批判不无偏颇，《说文》通过汉字字形分析探求汉字造词时的本义，属于汉字形义之书。《六书故》“父以联子，子以联孙”的文字孳乳系统，是《说文》以后文字编排的新体系，系统完备，条理井然，这种编排体系和其“充类”“推类”说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字源和词源的研究。

汉语汉字系统论生成语文训诂方法论。语言文字研究的正确途径就应该是循着语言文字系统

生成发展规律而寻求意义。“夫文，声（应理解为有声语言）之象也……有其声则有其文……有有形而有声者，有事而有声者，有意而有声者。有形而有声者，象其形而声从之，求其义于形可也；有事而有声者，指其事而声从之，求义于事可也；有意而有声者，会其意而声从之，求其义于意可也。是三者虽不求诸声，犹未失其义也。至于谐声，则非声无以辨义矣。”“三者不求诸声”似乎与“六书以形人声而已”矛盾，实际上象形、指事、会意是以字形和字音两者表义，通过字形、字音都可以求义，而谐声和假借则只以声表义，“非声无以辨义”，“声”是意义和文字之间的纽带，他的这段论述揭示了传统训诂学形训、声训、义训的发生学依据——通过造字原理阐明语言文字解说的依据，具有科学性。

“夫文生于声者也，有声而后形之以文，义与声俱立，非生于文也。”对音、形、义的关系认识可以说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是对当时“右文说”的偏差以及王安石之流借助字形臆解文字流弊的矫正。“侗尝谓当先叙其声，次叙其文，次叙其名，然后制作之道备矣。声，形而上者也；文，形而下者也。非文则无以著其声，故先文而继以声。”戴侗立足于语言的声音来认识语言和文字系统，进行语言文字训诂，这就抓住了语言文字研究的关键。

“六书皆以形人声”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是汉语声训和假借的理论基础。以前的训诂家都知道运用声训，也有一些人开始对声训理论进行探索，如晋·杨泉《物理论》解释“坚、紧、贤”，王圣美的“右文说”，等等，但这些探讨过于拘于字形，只有片言碎语，不成体系。而戴侗则在此基础上突破字形的束缚，提出了“因声以求义”的主张，实是有清一代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等“因声求义”理论的先导。

通过系统生成的研究，戴侗明确指出假借产生的根源。因为“六书皆以形人声”，“义与声俱立”，“文，声之像也”，文字是通过语音记录语言的符号，因而汉字音同音近就可能假借，批判了许慎解说“假借”的一些错误，进而指出其“不知假借之本义”，戴侗的假借理论明显优于许慎。《说文》常常把字义引申和文字假借混为一谈，其所举“令长是也”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具体解说文字的时候更是多见。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还常把通假、假借和引申混为一谈。

“假借者，谓本无而借于他也。”“所谓假借者，义无所因，特借其声，然后谓之假借。凡虚而不可指象者多假借。有其声而无所依以立文，故必借他文以备用，此假借之道也。”这是对假借最恰当的说明，而引申义则是“皆有本义，而生所谓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非外假也。”就把假借与引申划分清楚了。

由于假借“特借其声，借他文以备用”，在训释假借时，“不可以形求，不可以事指，不可以意会，不可以类传，直借彼之声以为此之声而已耳，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不可不知也。”对后世训诂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戴侗解释文字，在字形方面，直接采用金文字形，对清代古文字学研究有所启发。由于当时掌握的金文字数少，他往往杜撰字形，因此受到后人诟病。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表现出他对语言文字追本溯源的努力，而且戴氏解说文字颇有独到之处，这也是后人所承认的。

戴侗对字义词义系统的分析研究也显示出其独到的见解。以前出现的经籍注疏和训诂专书要么解释字词在文句里的意义，要么解释字词的本义，要么解释字词的常用义，《六书故》则不仅解释本义、引申义、假借义，还梳理文字、词义发展演变的线索，使之成为一个词的意义系统，这是戴侗解释字（词）义的创见。例如：《六书故·天二》：“朔，所角切，月之初一日也；引之为初义；借为朔方之朔，北方也”。这样解释字（词）义显然比此前的解释适用，已经十分接近今天字典辞书的词义解释了，对后世字典辞书释义的影响显而易见。

“凡字书有二：以文求之者，其传于今则有《说文》《玉篇》《类篇》诸书焉；以声求之者，则有《唐韵》《集韵》诸书焉。”前人字书把语言文字音、形、义三个要素割裂开来，要么“以文求”，要么“以声求”，大都偏于一隅，缺乏系统观念，难以“尽文字之情”，《六书故》则是以文求、以声求、以义求的文字学和语言学著作。他的这种文字编排体系和语言文字学思想远在当时的文字学家和六书学家如郑樵和杨桓之上。“由宋以来，文字学上的改革，到他是集大成了，他的解释有些地方实超过许慎”。<sup>[4]</sup>

### 三、结语

戴侗的语言文字系统理论，环环相扣，大系统包孕小系统，系统之间凭借音、形、义等内在联系有机组成，从而又可按各自的区别与联系分析出层层不同的小系统，如文字系统、语言系统、“六书”系统、语音系统、语义系统、实词系统、虚词系统等。从系统生成的角度探讨语源和词源，对传统训诂学进行理论探讨，联系语言文字系统的发展来研究语言文字问题。所以他说：“六书者，群经诸子百氏之通释也。六书苟通，由是而往，天下之书不待注疏皆可读也；六书不通，而以臆说缪为之注疏，是瞽而为向者也，只益其迷，注疏滋多，学者滋惑”。他的“六书”观念并不仅仅是六种造字法，而是以这个特定的名称指代整个汉语言文字系统，要求从系统上把握汉语汉字，而前代一些注疏家却昧于此，割裂系统联系，烦琐考证，以致“注疏日繁，经义益晦。”

#### 参考文献

- [1] 唐兰. 古文字学导论[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1
- [2] 吴泽顺. 戴侗的“充类”说[J]. 语言研究, 2004, 24 (1): 74-76
- [3] 陈会兵. 中国传统语言学的词类研究之检讨[J].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 2004, 20 (1): 82-86
- [4] 唐兰. 中国文字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The Systematic Theories on Chinese Philology and Characters of *Liu Shu Gu*

CHEN Huibing

(Chinese Department, Chongqing Three-Gorges University, Wanzhou, China 404000)

**Abstract:** *Liu shu gu*, edited by Dai tong, is a very important book on Chinese philology and characters in late Nan-Song dynasty. He considers that the character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have the general nature of a system from the systematic perspective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By re-arranging Chinese characters system and interpreting words and pursuing the law of words, he gains a great achievemen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study.

**Key words:** *Liu Shu Gu*;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Systematic theories; Theories of words interpreting